

# 北欧国家的差异化联盟选择\*

陈慧文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欧安全与防务政策出现分化,挪威、丹麦和冰岛同年加入北约,而瑞典与芬兰则长期保持中立。直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典和芬兰才决定加入北约,北欧防务政策至此归于统一。通过引入区域层次的分析视角,本文将“区域性小国集团”作为研究主体,并设立“历史经验”与“邻国政策参考”两个自变量。其中,前者作用于威胁感知,后者则发挥黏合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项研究假设,并构建区域层次差异化联盟选择的动态模型。本文认为,不同的历史经验导致差异化的威胁感知,体系或区域层次的威胁触发结盟反应,而邻国效应则进一步黏合选择一致的国家,最终形成差异与协同并存的区域安全结构。案例检验发现,来自瑞典的区域层次威胁加速了挪威与美国结盟的进程,丹麦和冰岛则参考挪威的选择同步加入北约;成功的中立历史促使瑞典坚持中立原则,而来自俄罗斯的体系层次威胁触发瑞典和芬兰两国的结盟反应,其中瑞典参考芬兰的选择决定同步加入北约。

**关键词:**联盟选择 区域层次分析 区域性小国集团 北欧防务政策 邻国政策参考

## 一 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欧地区五个国家分两批先后加入北约:挪威、丹麦和冰岛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于1949年入约;瑞典和芬兰则长期坚持中立,直至

\* 本文初稿曾在第二届“区域国别学视野下的欧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上宣读,感谢田德文老师及与会专家的评审意见。同时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秦立志老师的修改建议,以及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才同步申请并最终加入。由此,北欧地区实现了“全面北约化”。这一历史进程引出了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如何解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北欧国家的安全与防务政策从分歧走向趋同的现象?为什么最初呈现出“3+2”的集团分化趋势?哪些因素导致挪威、丹麦和冰岛做出了相同的联盟选择,而瑞典和芬兰则共同坚持中立,此后又同步调整政策?在上述两个国家集团内部,各国角色始终存在差异:在挪威、丹麦和冰岛的集团中,挪威是加入北约的推动者、丹麦是摇摆者、冰岛是追随者;在瑞典和芬兰的集团中,1949年瑞典是主动中立者而芬兰是被动中立者,2022年则变为芬兰是推动者、瑞典是摇摆者和追随者。如何解释不同国家在结盟积极性上的差异性?

夹在两个竞争性大国之间的小国如何进行战略定位,即如何处理与两个大国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其生存的根本。作为体系层次战略的应对者而非制定者,小国无法如超级大国那样推动全球性大战略,因此,或通过外交手段保持与大国关系的平衡,或当地缘压力超过阈值时选择与一方结盟以制衡另一方。这涉及“国家倾向性”问题,即一国对目标国家在情感和预期上的亲疏与好恶。当这种隐性的倾向转化为显性的行为,便可用“联合”(Alignment)一词描述国家在战略偏好光谱上的位置。在已有文献中,“Alignment”经常被译为“结盟”,致使其与“联盟”概念混同,但两者存在重要区别。联盟(Alliance)是指国家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或不使用军事力量对抗非成员国的正式联合,是国家间相互军事援助的承诺。联盟由条约等正式协议产生,明确针对外部特定国家;<sup>①</sup>联合则是一国对目标国家在未来互动中支持或反对自身的预期,支持、反对或忽视的态度分别决定了友好、敌对或冷漠的国家间关系。联合标志着敌对与友好的分界线,能识别出对手和朋友,其生成基础是共同利益而非正式条约。<sup>②</sup>联盟是联合的子集,是强化了基于正式协议的联合;联合现象更广泛,形式更多元。<sup>③</sup>联合的类型包括联盟、阵线(Coali-

---

<sup>①</sup>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 8; Glenn H. Snyder, “Alliances, Balance, and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1, 1991, p.123.

<sup>②</sup>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p.6, 21, 25; Glenn H. Snyder, “Process Variables in Neorealist Theory,”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3, 1996, p.173.

<sup>③</sup> 刘丰:《从联盟体系到盟伴网络:概念厘清与理论适用性探讨》,载《战略决策研究》,2024年第5期,第8页; Glenn H. Snyder, “Process Variables in Neorealist Theory,” p.174.

tion)、安全共同体、战略伙伴关系、协调(Concert)、协约以及互不侵犯条约。其中,后三种类型尚未形成系统性概念。<sup>①</sup>表1列出了联合常见的四种类型及相互间关系。为保证后续模型建构和案例检验的简洁性,本文选取形式最严格、最易观察且影响力最大的联盟现象作为具体分析对象。在此,联盟选择(Alliance Choices)特指北欧国家就是否以及何时加入北约所作出的决策。

之所以选取北欧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对于欧洲各次区域而言,西欧地区7个国家中有5个北约成员国,中欧地区8个国家中有5个北约成员国,东欧地区17个国家中有11个北约成员国,南欧地区9个国家中有4个北约成员国;只有北欧地区的5个国家全部加入北约。<sup>②</sup>此外,北欧国家以1949年和2022年为关键时间节点,整齐地分批入约。加之各国实力与体量相近,使其成为研究同一地缘区域内国家差异化联盟选择的理想案例。本文尝试探索区域性小国集团的联盟决策问题,因此不涉及联盟维持、分化对手联盟以及联盟瓦解的情况。<sup>③</sup>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聚焦于小国加入联盟的选择,而非大国组建联盟的行为;研究层次侧重于区域层次国家集团的联盟选择,从而有别于经典的体系层次分析、大国分析和联盟形成的双边二元分析。<sup>④</sup>简言之,本文强调非大

---

① Thomas 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8, No.1, 2012, pp.59–72.

② 具体而言,西欧地区的北约成员国有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未入约的有爱尔兰、摩纳哥;中欧地区的北约成员国有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未入约的有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东欧地区的北约成员国有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黑山、北马其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土耳其,未入约的有塞尔维亚、波黑、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南欧地区的北约成员国有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未入约的有马耳他、梵蒂冈、圣马力诺、安道尔、塞浦路斯;北欧地区的5个国家均为北约成员国。

③ 按照联盟的生命周期进行分类,联盟政治研究可以分为联盟的形成、维持、转变和瓦解,此外还有分化对手联盟、结盟与军备的选择等领域。本文研究对象属于广义的联盟形成范畴,准确而言是小国加入联盟的决策研究。

④ 经典的层次分析法为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国内层次分析,缺少区域视角;既有联盟研究多为大国研究,缺少小国视角;已有的联盟形成理论多为双边联盟形成的二元研究,缺少多边视角。参见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6–47; Benjamin Fordham and Paul Poast, “All Alliances Are Multilateral: Rethinking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0, No.5, 2016, pp.842–843.

国、区域层次、国家集团的联盟选择,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决策视角。全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界定概念并说明案例选择依据;第二部分进行文献回顾,梳理既有研究如何强调外部威胁与大国拉拢对小国结盟的触发作用,并指出层次分析法与联盟形成理论结合不足的现状;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设立“历史经验”与“邻国政策参考”两个自变量,并构建因果机制模型;第四部分开展案例检验,将北欧国家按不同联盟选择划分为两个集团,验证模型与假设;第五部分总结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表 1 联合的类型与周期

	联合			
	联盟	阵线	安全共同体	战略伙伴关系
特征	正式	非正式		
形成基础	条约协议	共同利益		
关系光谱	硬安全合作 ←————→ 软安全合作			
反义	非联合			
周期	调整:再联合 终止:去联合			

注:表由作者根据以下文献整理。参见 Thomas 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pp.53-76。

## 二 文献回顾

小国如何进行战略定位,如何处理区域和体系层次的国家间关系,以及如何安排与各国的亲疏程度,构成了小国外交政策倾向性、其战略选择以及联合选择的核心议题。<sup>①</sup> 鉴于此,本小节梳理的文献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夹在竞争性大国

<sup>①</sup> 外交政策选择 (foreign policy choices)、战略选择 (strategic choices)、联合选择 (alignment choices) 目前尚无统一定义,在本文中均指国家在制衡、对冲和追随三类行为中的选择,即选择以哪种行为模式处理与目标国的关系。在无严格指代的情况下,这三个词汇替换使用。

之间的小国通常面临制衡、对冲(中立)和追随三类联合选择,本文关注的是小国从中立转向结盟所需的结构性条件;其次,小国与特定大国结盟的过程包括前期的倾向性积累,以及外部威胁所触发的结盟反应;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引入有关区域层次分析方法的文献。

### (一)小国从中立到结盟的转换

联合行为(Alignment Behavior)指一国根据关键利益的趋同或分歧程度,选择与大国靠近或远离的方式和程度,<sup>①</sup>主要分为制衡、对冲和追随三类;<sup>②</sup>联合选择(Alignment Choices)则指一国根据风险和威胁感知,在上述三类联合行为中做出决策的过程。<sup>③</sup>对于小国如何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以确保生存,传统权力平衡理论主张与较弱一方结盟,而以沃尔特(Stephen M. Walt)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威胁平衡理论,主张国家会制衡最具威胁性的一方。也就是说,当面临重大外部威胁时,国家或制衡或追随;<sup>④</sup>制衡是应对外部威胁的第一反应,即使盟国的支持存在不确定性,国家也会选择制衡。<sup>⑤</sup>斯奈德(Glenn H. Snyder)对此提出批评,指出二分法忽视了其他联合选择,如中立、改善与第三方关系以及与威胁性国家的和解或妥协。<sup>⑥</sup>对小国而言,纯粹的制衡或追随均面临困境:其脆弱性决定了过度靠近大国可能丧失自主性并陷入大国间冲突;过度疏远则可能失去庇护甚至招致敌意。<sup>⑦</sup>因此,采取对冲或中立策略,与各大国保持适当距离,成为许多小国的现实选择。对冲与中立具有相似性,基本思想都是不选边站队,本文在后续分析中将根据北

---

① Cheng-Chwee Kuik,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5, No.100, 2016, p.501.

② 制衡是寻求安全最大化的行为,对冲是寻求保险最大化的行为,追随是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参见 Cheng-Chwee Kuik, "Explaining Hedging: The Case of Malaysian Equidista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46, No.1, 2024, pp.46-47.

③ Cheng-Chwee Kuik, "Shades of Grey: Riskification and Hedging in the Indo-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36, No.6, 2023, p.1207.

④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⑤ 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2, 1988, p.308.

⑥ Glenn H. Snyder, "Alliances, Balance, and Stability," p.128.

⑦ Cheng-Chwee Kuik,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0, No.2, 2008, pp.160-161, 164-165.

欧文献的语境使用“中立”概念。综上所述,制衡、对冲(中立)和追随是三种主要的联合行为,国家在其中做出联合选择。

那么,原先中立的小国会在何种情况下选择与特定的国家结盟,即从中立的联合行为转变为结盟以制衡或结盟以追随的联合行为?<sup>①</sup> 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自助体系中,各国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将选择或中立或结盟的策略。<sup>②</sup> 郭清水构建的威胁紧迫性与盟友可靠性矩阵,细分了不同情境下的国家选择。<sup>③</sup>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促使小国彻底放弃中立、转向结盟的结构条件。随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体系压力上升,处于关键地缘位置的小国,尤其是身处两极对抗前沿者,其中立空间会被急剧压缩。大国为争取博弈优势会竞相拉拢这些国家,要求其明确承诺,致使小国选边压力骤增。当体系压力超过小国承受阈值时,如大国发动武装进攻,小国的中立政策便难以为继。简言之,大国竞争导致的区域两极压力以及潜在盟国的拉拢邀约,共同推动小国做出从中立转向结盟的决定。

## (二)小国加入联盟的前期倾向与触发机制

小国选择加入特定联盟不仅基于安全计算,还涉及历史、文化和种族等因素。<sup>④</sup> 斯奈德区分了结盟的体系性激励(Systemic Incentives)与非体系性激励(Nonsystemic Incentives)。前者指体系和结构提供的结盟动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相互使用武力的自由及其带来的恐惧是结盟的主要动力,防止权力向任何一国集中的共同利益是产生防御性联盟的动因;<sup>⑤</sup> 后者指非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和实力差异提供的结盟动机,共同利益、冲突历史、亲缘关系和实力差异产生了正式联盟形成之前业已存在的联合模式,增加了特定行为体间结盟的可能性和可预测性。<sup>⑥</sup>

---

① 此处的“结盟以制衡”与“结盟以追随”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区分的关键在于结盟对象国与威胁来源国是否重合。此处将二者归为一类,以区别于不结盟的中立政策。

② [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页。

③ Cheng-Chwee Kuik, “Explaining Hedging: The Case of Malaysian Equidistance,” pp.48-49.

④ [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316-317页。

⑤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p.18,52;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1984, p.462.

⑥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p.464-465;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 1990, pp.109-110.

这种共同利益—冲突—亲缘关系模式(Common Interest—Conflict—Affinity Pattern)正是结盟前倾向性积累的概念化体现。此外,地理邻近、民族、文化、语言、历史记忆、政体和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可能强化这种倾向。<sup>①</sup>因此,非结构性因素的功能在于形成一种先于正式盟约的选择偏好,为“与谁结盟”做好准备。

在倾向性积累的基础上,结盟的最终触发关乎时机与必要性。关于联盟形成的触发机制,权力平衡理论认为,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失衡触发结盟,<sup>②</sup>但其解释过于宏观,导致预测模糊;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威胁的失衡触发结盟,综合实力、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和进攻意图构成威胁的来源。<sup>③</sup>本文将后者作为解释北欧国家加入北约的触发机制的核心理论,认为超过小国承受阈值的外部威胁将触发结盟反应。但该理论虽然可以解释单个国家的结盟行为,却无法解释为何面临相似威胁冲击的国家会呈现出差异与协同并存的联盟选择模式,因此需要引入区域层次的分析视角。

### (三) 区域层次分析与联盟形成理论的结合研究

经典的层次分析方法缺少区域层次分析,新兴的区域主义理论大多研究区域治理以及区域性国际组织等议题。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和国家层次分析,新现实主义侧重国际体系层次分析,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层次分析,<sup>④</sup>华尔兹总结的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分析构成经典的层次分析方法。<sup>⑤</sup>由此可见,地区作为国际体系的子系统,受关注程度稍显不足。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区域层次分析视角仅获得少量运用,例如沃尔特在讨论单

---

<sup>①</sup> Brian Lai and Dan Reiter, “Democracy,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1816–1992,”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4, No.2, 2000, pp.206–212; Benjamin Fordham and Paul Poast, “All Alliances Are Multilateral: Rethinking Alliance Formation,” pp.848–851.

<sup>②</sup>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页。

<sup>③</sup>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4, 1985, pp.8–13; 岳鹏、陈慧文:《北欧的再安全化与挪威的选择》,载《欧洲研究》,2023年第2期,第145页。

<sup>④</sup> [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30–33、67页。

<sup>⑤</sup> [美]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6、125页。

极体系下的联盟战略时提出了区域制衡(Regional Balancing),认为区域国家寻求与体系大国结盟的行为看似是追随大国,实则是制衡邻国。<sup>①</sup>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区域主义理论主张将区域视为介于全球与国家之间的独立分析层次,强调区域层次的分析方法。郑先武提出由区域间、区域和微区域三分法构成的大区域观,<sup>②</sup>对区域层次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划分。此外,从议题内容的角度来看,新区域主义理论主要涉及治理议题,通常探讨区域合作、区域治理、区域性国际组织等,<sup>③</sup>相关文献对区域层面联盟形成现象的研究较少。

布赞(Barry Buzan)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基于区域视角,探讨冷战后全球安全秩序的层次问题,为区域安全分析提供了重要框架。该理论包括国内、区域、区域间以及全球四个层次,强调基于区域的国家集群及其内部的友好—敌对模式。<sup>④</sup>然而,该理论根植于建构主义与安全化路径,<sup>⑤</sup>与联盟形成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且其否认北欧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安全复合体,而是将其视为欧洲的一部分。<sup>⑥</sup>本文认为,可以将北欧地区视为一个独立的地缘区域与国家群体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不足,致力于将区域层次分析与联盟形成理论相结合,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北欧国家差异化联盟选择的动态模型。

---

①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2009, p.111.

② 郑先武:《区域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多重角色——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案例比较分析》,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5期,第125页。

③ 耿协峰、陈灵芝:《超越“欧盟中心主义”: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载《欧洲研究》,2025年第3期,第32页;杨娜、程弘毅:《治理诉求、地区认同与区域组织的差异化变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0期,第33页。

④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51-52; Barry Buz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 The Interplay of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6, No.2, 2003, p.145.

⑤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48.

⑥ Barry Buzan,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44.

### 三 北欧国家差异化联盟选择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区域层次的分析方法,从小国和小国集团的视角自下而上地探究加入联盟的决策差异问题,有别于大国研究、自上而下的联盟组建研究以及传统的双边联盟形成分析。本文将区域性小国集团作为区域层次的研究主体;沿用威胁平衡理论关于外部威胁触发结盟反应的核心逻辑,设立“历史经验”作为影响威胁感知,尤其是对进攻意图进行判断的自变量,“邻国政策参考”作为相对独立的区域层次变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三条研究假设,构建一个用以说明小国差异化联盟选择影响因素及模式的 $3\times 2$ 矩阵,并建立一个针对北欧国家差异化联盟选择的双层动态分析模型。

#### (一) 研究主体与解释变量

在研究主体方面,区域性小国集团(Regional Small Power Grouping)为同一地缘区域内、具有相似体量且表现出相同战略选择偏好和行为的小国组成的国家集团。该概念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同一地缘区域,即对象国家群处于相同的地缘空间范围内,这确保了它们在地理位置、语言、民族、价值观和历史联系等方面的相似性。二是相似体量,即对象国家间的实力大致相等或相近。在理论建模时可以假定其完全相等,但现实中小国集团内部通常呈现“小强国+小国+小弱国”的实力排列,并可形成单极、两极或多极结构。三是相同战略选择偏好和行为,这是划分不同区域集团的根本标准。具体而言,它指的是同一集团内国家在是否结盟、与谁结盟、何时结盟等重大防务决策上进行协商并保持一致,从而同步调整国家安全战略。为兼顾模型的适用性与简洁性,本文将区域结构设定为两极,即一个区域内存在两个相互区分的区域集团。

本文包含两个自变量,其一为历史经验(Historical Experience)。此变量用于解释不同区域集团联盟选择的差异性,解释机制是,历史经验影响了对威胁国进攻意图的判断并触发结盟行为。一方面,根据性质差异,历史经验可分为积极的

与消极的两种。<sup>①</sup> 积极经验是指历史上成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激励国家延续原有选择;消极经验是指历史上失败的安全与防务政策,激励国家改变原有选择。同一时期采取相同政策的不同国家,可能因结果不同而积累相异的历史经验,进而导致后续不同的政策选择。另一方面,根据来源不同,历史经验可分为战争经历与殖民经历。<sup>②</sup> 小强国之间为争夺地区霸权而发生战争,以及小强国与小弱国之间因长期统治与被统治而形成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均会塑造不同的历史记忆:战争胜利方倾向于坚持原政策,失败方则倾向于更改政策;殖民统治的经历可能带来殖民者对该地区继续控制的企图,而被殖民者则强烈渴望摆脱宗主国并获得彻底独立。

其二为邻国政策参考(Reference to Neighbour)。此变量用于解释同一区域集团内部联盟选择的同步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层次变量。该变量的特征之一是具有参考性,指在实力相近的小强国之间,若存在防务政策上的“犹豫摇摆者”,其往往会参考同一区域集团内实力相似国家的政策选择,邻国效应最终促使其下定决心做出同步调整。该变量的特征之二是体现连带性,指在小强国与小弱国之间,若小弱国是微型或迷你型国家,往往会选择完全追随与其存在友好和捆绑关系的小强国。外界通常默认,争取到该小强国即意味着连带争取到了其追随者,而无需单独与小弱国谈判。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捆绑关系可能源于历史上长期殖民统治形成的政策黏性,<sup>③</sup>即被殖民国家在获得主权之后依然选择追随前宗主国。

---

<sup>①</sup> Hans Mouritzen and Mikkel Runge Olesen, “The Interplay of Geopolitics and Historical Lessons in Foreign Policy: Denmark Facing German Post-War Rearmamen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5, No.4, 2010, p.411.

<sup>②</sup> 其一,邻国间关系并不全是友好团结,很多情况下邻国之间存在争端,对邻国的恐惧大于对遥远大国的恐惧。地区国家间经常存在猜疑和政策差异直至地区领导权的竞争。其二,帝国遗产和殖民经历是理解北欧防务政策的重要视角,宗主国与被殖民国家之间的主权博弈一直持续到后者获得独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参见 Melissa M. Le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Incomplete Sovereignty: How Hostile Neighbors Weaken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2, No.2, 2018, p.288; Rebecca Adler-Nissen and Ulrik P. Gad, “Introduction: Postimperial Sovereignty Games in the Nordic Reg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9, No.1, 2014, p.7, 20。

<sup>③</sup> 后殖民国家与前殖民政治结构存在相似之处,布赞认为可以用历史安全化(historical securitisation)予以解释。参见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134。

这与上述殖民经历激发独立诉求的论断似乎矛盾,但可以解释为,摆脱前统治者并寻求政策独立是常态且需要实力支撑,当国家极其弱小以致于丧失任何抵抗可能时,则会出现反常的、依赖前宗主国的现象。

在因变量及变量间关系方面,本研究以联盟选择差异(Differences in Alliance Choices)为因变量,特指北欧国家在结盟与否以及结盟时机上的决策差异,即在同一时间点,有的国家选择加入北约而有的选择不加入,或在不同时间点分批加入的现象。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可概括为,在外部威胁冲击下,历史经验通过影响对进攻意图的判断,放大或缩小特定来源的威胁感知,从而触发不同的结盟行为,致使区域内各国联盟选择出现分化。与此同时,邻国政策参考发挥黏合作用,将联盟选择趋同的国家聚合为一个区域集团,并与选择相异的集团国家互相分立,最终形成区域层次上两个小国集团并存的二元结构。

## (二)假设与模型

本文的研究假设主要有三:假设1为,安全威胁是小国联盟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区域或体系层次的压力促使小国从中立转向结盟。假设2为,若一国历史上遭受过域内其他国家的武装进攻或殖民统治,则其倾向于寻求与域外大国结盟;若历史侵略主要来自域外大国,该国会倾向于寻求与另一域外大国结盟。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需排除该国受直接胁迫的情况。假设3为,区域性小国集团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具有参考性和连带性,往往表现为统一行动和协同决策。

如表2所示,本文将构建一个3×2的矩阵,从单个国家的视角,阐述影响小国联盟选择的因素及其可能的结果模式。矩阵的纵向维度为“权力接受程度”,反映小国对体系和区域层次国家的友好—敌对划分,其中历史教训导致权力拒绝,从而倾向于制衡;邻国政策参考代表权力接受,从而倾向于追随;中点则代表中立。横向维度为“威胁来源层次”,是触发结盟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若威胁源于体系层次的大国,将导致制衡行为;若对象国不将主导国视为威胁而是领导者,则可能出现追随。若威胁源于区域层次的小国,将促使对象国与域外大国结盟;若对象国将目标国视为伙伴,则可能在共同区域威胁下携手与同一域外大国结盟。需要说

明的是,一方面,本矩阵未考虑区域防务联盟,主要因为与弱国结盟效益较低,<sup>①</sup>且并非所有小国都具备组建区域联盟的实力与威望,因此与域外大国结盟通常是更优选择;另一方面,此矩阵预测的是单个国家的行为模式,只要不同对象国最终与同一目标国结盟,即可形成区域性小国集团。

表 2 小国联盟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结果模式

		权力接受程度		
		拒绝 (历史教训)	中点	接受 (邻国政策参考)
威胁来源层次	体系层次	结盟以制衡	中立	结盟以追随
	区域层次	与域外大国结盟	中立	与域外大国结盟

注:表由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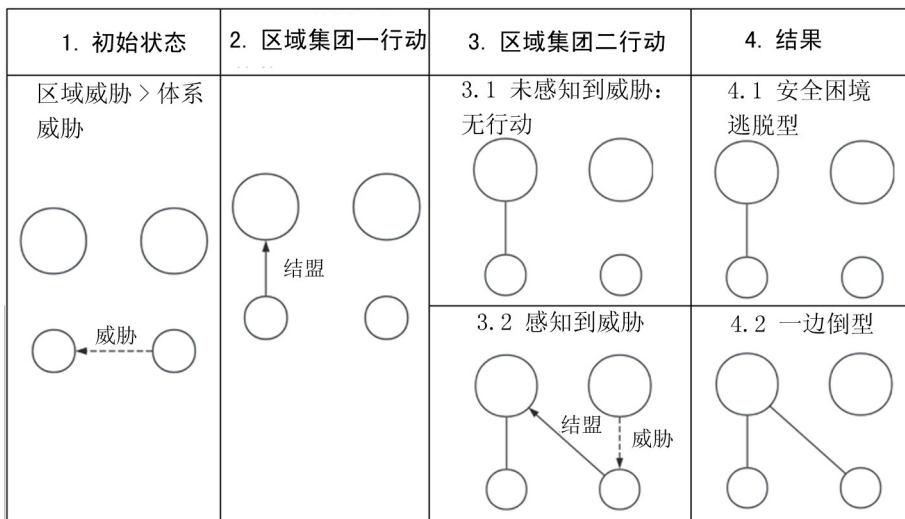
此外,本研究还将构建双层动态分析模型,从区域集团的视角,阐述北欧区域性小国集团差异化联盟选择的因果机制和演变进程。如图 1 所示,假定一个区域内存在两个同质的国家集团,每个区域集团由数个实力相似的小国组成,两集团国家数之和等于区域内国家总数。与此同时,体系层次中存在两个同质且相互竞争的全球性大国,任一大国实力均大于两个区域集团之和,图中以圆圈示意。该模型从左到右依次呈现为初始状态、区域集团一行动、区域集团二行动和结果,类似于一个两人单次博弈,但结果可动态转化,如结果 4.1 可转化为行动 3.2,从而产生新结果。在此需要明确:第一,本模型不同于既有理论,其初始状态中所设定的威胁主要来自区域层次,以防落入两极体系中联盟选择的传统理论范畴;第二,威胁感知具有主观性,外界只能观察到客观的结盟行为和联盟结果,图中分别以虚线和实线表示;第三,“安全困境逃脱型”结果指的是一方与域外大国结盟后,没有引发另一方寻求与另一大国结盟的对等反应,即地区对手间未形成不安全螺旋,<sup>②</sup>

① 斯奈德已经论证:强者与弱者结盟,当对手弱时,大部分价值流向弱者。即当威胁来自区域层次的弱国时,非对称联盟对弱者的价值更高。此处不再讨论威胁来自体系层次大国的情况,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弱者之间的联盟是无效的。参见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p.60。

② 斯奈德的安全困境理论认为,对手博弈中的“不安全螺旋”(insecurity spiral)会加剧对手间的安全困境。参见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p.468-470, p.477。

未出现针锋相对的博弈结果和地区—体系双层纵向两极对抗格局。

图1 北欧国家差异化联盟选择的双层动态分析模型



注：图由作者自制。

#### 四 案例分析

北欧五国具有诸多相似性,并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这些国家诞生于共同的维京掠夺史,<sup>①</sup>拥有“北方”(the North, Norden)的共同身份,在地理位置、语言、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传统等领域具有同质性和共同体意识。<sup>②</sup>同时,国家之间也存在竞争。涵盖挪威和冰岛的丹麦帝国与包括芬兰的瑞典帝国曾为了争夺波

<sup>①</sup> 公元800年至1300年,北欧国家形成。维京人的掠夺和对外战争使欧洲尤其是英格兰先进的治理和军事技术扩散到北欧地区,开启了丹麦、挪威,以及瑞典和冰岛的国家建构。参见 Eric Grynviski and Sverrir Steinsson, “Wisdom Is Welcome Wherever It Comes From: War, Diffus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candinav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7, No.2, 2023, pp.294–296, p.306, 318。

<sup>②</sup> Douglas Brommesson et al., “From Variation to Convergence in Turbulent Times—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hoices Among the Nordics 2014–2023,” *European Security*, Vol.33, No.1, 2023, p.21; Tuomas Forsberg, “The Rise of Nordic Defence Cooperation: A Return to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5, 2013, p.1175。

罗的海霸权进行了一系列战争。<sup>①</sup> 战争经历加深了不同区域集团之间的对立,殖民经历则影响同一区域集团内部的联盟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似的文化 and 国际环境并没有转化为一致的结盟政策:1949年挪威、丹麦和冰岛选择加入北约而瑞典和芬兰坚持中立,后者直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才同步申请并最终入约。至此,北欧安全与防务政策完成了由分歧到统一的演变进程。下文按照亲缘关系和联盟选择的差异,将北欧国家分为两个区域集团,并以1949年和2022年为关键时间节点,对上文假设与模型进行检验。

### (一) 区域性小国集团一:挪威、丹麦和冰岛

挪威、丹麦和冰岛的亲缘性源于长期共生的国家间关系。丹麦帝国自16世纪起便包括挪威和冰岛,至18世纪,挪威与丹麦形成更为平等的丹麦—挪威双王国共同体,<sup>②</sup>两国悠久的防务合作历史为其日后结盟奠定了基础。<sup>③</sup> 冰岛在13世纪时先后隶属于挪威与丹麦,直至1944年才完全独立。<sup>④</sup> 囿于国家实力弱小和政策黏性,冰岛独立后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反控制诉求,在外交实践中持续依赖其北欧伙伴,尤其与挪威建立了特殊的密切联系,视后者为处理对欧事务的中介和斡旋者,从而形成冰岛—挪威特殊关系。<sup>⑤</sup>

自变量“历史经验”以及区域层次威胁推动小国结盟的检验过程如下。一方面,被瑞典殖民的历史记忆促使挪威拒绝瑞典关于建立北欧防务联盟的提议,来

---

<sup>①</sup> Alyson J. K. Bailes et al., ed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48-49.

<sup>②</sup> 丹麦曾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版图庞大的帝国,16世纪时管辖丹麦、挪威、冰岛、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格陵兰、法罗群岛以及众多海外殖民地。参见 Morten Skumsrud Andersen, “Semi-Cores in Imperial Relations: The Cases of Scotland and Norw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2, No.1, 2016, pp.198-199.

<sup>③</sup> Håkon Lunde Saxi, *Norwegian and Danish Defence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2010, p.5, 17.

<sup>④</sup> 在13世纪被挪威王国统治之前,冰岛基本上处于既无国家也无民主社会的孤立状态。冰岛1904年实行自治,1918年获得主权,1944年完全独立。参见 Eiríkur Bergmann, “Iceland: A Postimperial Sovereignty Projec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9, No.1, 2014, p.38.

<sup>⑤</sup> Eiríkur Bergmann, “Iceland: A Postimperial Sovereignty Project,” p.50; Valur Ingimundarso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Iceland 1945-1951,”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37, No.2, 2012, p.211.

自瑞典的区域层次威胁以及苏联的威胁推动挪威的入约进程。1814年,战败的丹麦根据《基尔条约》(Treaty of Kiel)将挪威割让给瑞典。<sup>①</sup> 挪威虽短暂抵抗,<sup>②</sup>但仍被迫接受瑞典的统治,直至1905年才获得完全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威胁与体系两极压力骤增的背景下,瑞典于1948年5月提议与挪威、丹麦共建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防务联盟,并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替代方案。然而,在刚独立不久的挪威看来,该提议充分体现了前殖民者试图对其加以控制的意图,唤起了该国痛苦的殖民记忆。因此,瑞典被挪威视为首要的区域层次威胁。加之美国不愿对该中立联盟提供武器支持等,挪威遂拒绝了瑞典的提议,转而坚定寻求加入北约。此过程检验了假设1和假设2,并体现了矩阵中权力拒绝的两种情形及模型中的初始状态。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立政策的失败与被占领的经历,共同促使挪威和丹麦加入北约。挪威自独立以来长期奉行中立政策,<sup>③</sup>但1940年遭遇德国入侵和占领的经历,证明其中立政策的失败。加入北约前,丹麦曾以避免卷入欧洲大国间冲突为其外交政策宗旨。<sup>④</sup> 1814年和1864年两次战败导致领土丧失,使丹麦形成了避免卷入大国冲突的“小国心态”<sup>⑤</sup>与绥靖传统。<sup>⑥</sup> 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宣布中立,丹麦仍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相似的战争经历使丹麦、挪威两国深刻认识到,中立政策并不能确保安全,只有加入北约并获得美国

---

① 挪威自1380年起被丹麦统治,1814年被丹麦转让给瑞典。参见Rebecca Adler-Nissen, “The Faroe Islands: Independence Dreams, Globalist Separatism an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Postcolonial Home Rul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9, No.1, 2014, p.58。

② Arash Heydarian Pashakhanlou and Felix Berenskötter, “Friends in War: Sweden Between Solidarity and Self-Help, 1939–1945,”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56, No.1, 2021, p.88。

③ Håkon Lunde Saxi, *Norwegian and Danish Defence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p.19; Rolf Tamnes, “Småstatsrealisme i 70 År,”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7, No.1, 2019, p.50。

④ 自1720年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结束至1949年加入北约,丹麦的外交政策均旨在避免卷入欧洲大国间冲突,其非自愿地参与了拿破仑战争、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战争。参见Håkon Lunde Saxi, *Norwegian and Danish Defence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pp.17–18。

⑤ Anders Wivel, “Evig Aktivism i Uendelig Krig: Sikkerhed, Status og Strategisk Kultur i Dansk Udenrigspolitik,”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8, No.3, 2020, pp.412–413。

⑥ Alyson J. K. Bailes et al., ed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p.51。

的核保护才能抵抗苏联的威胁。需要说明的是,丹麦在斯堪的纳维亚防务联盟谈判中扮演了从属与摇摆的角色,芬兰因苏联的反对未参与,冰岛则被瑞典排除在谈判之外。<sup>①</sup> 此过程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 和假设 2,并展示了矩阵中国家权力接受程度由中立向拒绝的转变过程。

自变量“邻国政策参考”以及“安全困境逃脱型”结构的检验过程如下。一方面,在外部拉拢与内部参考下,三国同步加入北约。如上所述,挪威受历史经验影响,坚定、急切地寻求加入北约。丹麦则呈现相对冷淡与犹豫的态度,<sup>②</sup>其加入北约更多是基于中立和区域联盟均无法实现之后的务实选择,<sup>③</sup>背后可能仍受历史上失败主义心态的影响。在参考了挪威的选择后,丹麦最终做出了同步决定。<sup>④</sup> 冰岛自 1918 年获得主权后即宣布永久中立,但其对前宗主国的政策黏性与对挪威的特殊依赖关系,被美国和英国视为争取其入约的突破口。两国认为,只要争取到挪威与丹麦,冰岛必将跟随。<sup>⑤</sup> 此外,在美国看来,挪威、丹麦、冰岛三国占据遏制苏联的关键地缘位置,拥有北欧陆路最北线、波罗的海出海口以及北大西洋海上高地,因而具有垫脚石 (stepping-stone) 的重要战略价值。加之上述三国能削弱布鲁塞尔五国被苏联占领的潜在威胁,<sup>⑥</sup>因此,被美国极力拉拢加入北约。1949 年

---

① 其一,丹麦同意瑞典关于区域防务联盟的提议,以及后来选择加入北约,表明丹麦的摇摆性;其二,苏联反对建立北欧防务共同体,认为这是北约计划的延伸,并限制芬兰与北欧国家合作;其三瑞典拒绝了挪威关于允许冰岛作为观察员的请求;冰岛加入谈判时已是 1949 年 1 月,彼时谈判即将结束。参见 Efraim Karsh, “Finland: Adaptation an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 2, 1986, p.270, 274; Valur Ingimundarso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Iceland 1945–1951,” p.208。

② Håkon Lunde Saxi, *Norwegian and Danish Defence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p.21.

③ Fredrik Doeser,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 Small States: The Fall of the Danish ‘Footnote Polic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6, No.2, 2011, p.226.

④ Alyson J. K. Bailes et al., ed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p.255.

⑤ Valur Ingimundarso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Iceland 1945–1951,” p.206, 208.

⑥ Michael D. Cohen, “‘We Need Allies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How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used Multilateralism in Europe and Bilateralism in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0, No.4, 2025, p.582.

1月,斯堪的纳维亚防务联盟谈判破裂,挪威、丹麦和冰岛转而接受美国的邀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谈判;同年4月,三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北约。此过程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3,呈现了矩阵中三国由中立转向与同一域外大国结盟从而形成区域集团的过程,也对应模型中从初始状态到“区域集团一选择结盟”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联盟选择的分歧形成了“安全困境逃脱型”区域安全结构。1949年,瑞典和芬兰秉持中立,与区域集团一的结盟选择形成鲜明对比,北欧地区由此划分为两个国家集团。既然挪威将瑞典视为区域层次的威胁并带领丹麦和冰岛加入北约,为何瑞典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从而引发地区安全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在美苏对峙的大格局下,瑞典并未将挪威等国的行为视为对其安全的直接与重大威胁,因此未做出对等的结盟措施,最终形成“安全困境逃脱型”结果。此种区域安全结构在冷战时期被称为北欧平衡(Nordic balance),并一直延续到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才被打破。瑞典之所以未将挪威视为威胁,与其当时拥有北欧最强军事实力、<sup>①</sup>与美国和北约的非敌对关系、与苏联结盟的不可行性,以及其中立政策在历史上曾被验证有效等因素有关。以上展示了模型中“安全困境逃脱型”结果产生的全过程。

## (二) 区域性小国集团二:芬兰和瑞典

芬兰与瑞典的亲缘关系历史悠久。瑞典自12世纪逐步形成国家后主要向东扩张,在1809年前长期统治芬兰。<sup>②</sup>两国在数百年间形成了紧密的政治、文化与语言共同体。1917年芬兰从苏俄独立后,与瑞典未再发生战争或严重对立,<sup>③</sup>视彼

---

<sup>①</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冷战初期,北欧国家中只有瑞典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防工业,该国军事实力在北欧国家中最强。参见 Alyson J. K. Bailes et al., ed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p.234; Tuomas Forsberg, “The Rise of Nordic Defence Cooperation: A Return to Regionalism?” p.1166。

<sup>②</sup> 瑞典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是12世纪,晚于丹麦和挪威。丹麦和挪威的维京人的掠夺和贸易方向是西方,而瑞典维京人主要向东扩张。参见 Eric Grynviski and Sverrir Steinsson, “Wisdom Is Welcome Wherever It Comes From: War, Diffus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candinavia,” pp.315-316。

<sup>③</sup>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语是芬兰的官方语言之一;其二,1917年后,瑞典和芬兰之间关于奥兰群岛(Åland Islands)的领土争端问题也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参见 Arash Heydarian Pashakhanlou and Felix Berenskötter, “Friends in War: Sweden between Solidarity and Self-Help, 1939-1945,” p.88。

此为天然盟友、姐妹国家和北欧两国组(Nordic duo),在国际事务中强调对外政策和行动的协调,形成了瑞典—芬兰特殊关系。<sup>①</sup>

自变量“历史经验”以及小国结盟前倾向性积累的检验过程如下。一方面,迥异的历史经验塑造了两国中立政策的不同性质。瑞典的中立政策可追溯至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并持续至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失去北欧大国地位的瑞典为了避免卷入冲突和保护主权而选择中立。<sup>②</sup>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立国地位再次使其免受战火侵扰。<sup>③</sup>成功的经验、相对强大的军力以及历史积淀的大国自信,使瑞典在战后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压力,主动选择继续保持中立。与之相对,芬兰的历史则充满被迫与妥协。芬兰在被瑞典统治近7个世纪后于1809年被割让给沙俄,最终于俄国十月革命后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与苏联两度交战并失去大片领土。惨痛的战争经历和殖民阴影使芬兰深知,如果不能满足苏联在其西北边境的安全需求,自身的生存和独立就无法得到保障。鉴于此,芬兰率先向苏联释放了愿意承担防御责任的信号,这种向苏联表达善意并坚决拒绝为苏联的敌人提供援助从而保障自身独立和安全的防务思想被称为巴锡基维路线(Paasikivi line)。<sup>④</sup>1948年4月,双方签订《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协议禁止芬兰加入任何针对苏联的军事联盟,<sup>⑤</sup>即规定了芬兰的中立地位。综上所述,芬兰中立政策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是体系压力下的非自愿选择,具有外生性和务实性,

---

① Carmen Gebhard, “Soft Competition: Finland, Sweden and the Northern Dimen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36, No.4, 2013, p.365, 383; Douglas Brommesson et al., “From Variation to Convergence in Turbulent Times—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hoices among the Nordics 2014–2023,” p.34.

② Jessica L. Beyer and Stephanie C. Hofmann, “Varieties of Neutrality: Norm Revision and Declin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6, No.3, 2011, p.295, 297.

③ Christine Agius, “Transformed Beyond Recognition? The Politics of Post-Neutrali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6, No.3, 2011, p.373.

④ 二战后,芬兰总统巴锡基维(Juho Paasikivi)及继任总统吉科宁(Urho Kekkonen)推动实施了向苏联让步以保障自身独立的安全战略,苏联乐见并支持芬兰的中立。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Paasikivi—Kekkonen line)作为冷战时期芬兰处理与苏联关系的方法准则,基本实现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主权。参见Efraim Karsh, “Finland: Adaptation and Conflict,” pp.267–270, 272–274.

⑤ Jessica L. Beyer and Stephanie C. Hofmann, “Varieties of Neutrality: Norm Revision and Decline,” p.295.

从而与瑞典的中立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此处检验了假设 1 以及假设 2 的例外情况,即在直接胁迫下,小国可能无法选择制衡而被迫接受中立。另一方面,冷战后两国与北约关系不断深化,为最终入约积累了倾向性。尽管 2008 年格鲁吉亚战争与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芬兰与瑞典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持续上升,但两国仍维持名义上的不结盟。与此同时,西方的安全保障、共同利益和身份归属等亲缘关系促使两国不断加深与北约的防务联系,如 1994 年加入和平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Peace)、2014 年加入能力增强伙伴关系(Enhanced Opportunity Partnership)。尤其是芬兰,其在加入北约前已在实质上与西方安全体系高度融合,长期的倾向性积累为最终的身份转换做好了准备。<sup>①</sup>

自变量“邻国政策参考”以及“一边倒型”结构的检验过程如下。一方面,2022 年俄乌冲突成为压倒性的体系层次威胁,最终触发两国结盟反应,且瑞典的决策显著受到芬兰的影响。俄乌冲突的爆发使两国感知的体系层次威胁突破可承受阈值。而俄罗斯实力的下降成为两国完全融入西方阵营的机会窗口。<sup>②</sup>与此同时,美国拜登政府的明确支持形成了强大的外部拉力。在此背景下,2022 年 5 月 18 日,芬兰和瑞典正式申请加入北约。值得关注的是,芬兰比瑞典的结盟积极性更高。它基于其历史上被迫中立的脆弱感,反应更为迅速坚定,成为推动加入北约的积极倡导者;而历史上主动中立且获益的瑞典则表现出更多的犹豫与摇摆,不愿轻易放弃长期的中立身份。<sup>③</sup>然而,在芬兰已坚定转向北约,且其他替代方案,如组建瑞芬双边联盟均不可行后,瑞典在邻国政策参考机制的作用下,最终选择了与芬兰同步申请入约。<sup>④</sup>此过程验证了假设 1 和假设 3,并展现了矩阵中两国从中立转向与同一域外大国结盟,即形成区域性小国集团的过程,也对应了模型

---

① Roy Allison, “Russia, Ukraine and State Survival Through Neutral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8, No.6, 2022, p.1865; Matti Pesu and Tuomas Iso-Markku, “Insufficiency of Informal Alignment: Why did Finland Choose Formal NATO Member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2, 2024, p.574.

② 田德文:《“北欧神话”走向终结》,载《世界知识》,2024 年第 5 期,第 14 页。

③ Anna Michalski et al., “Small States and the Dilemma of Geopolitics: Role Change in Finland and Swede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1, 2024, pp.151–152, 154–155.

④ Douglas Brommesson et al., “From Variation to Convergence in Turbulent Times—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hoices Among the Nordics 2014–2023,” p.35.

中由结果 4.1 转化到行动 3.2 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两国入约标志着北欧形成“一边倒型”区域安全结构。随着瑞典和芬兰成为北约成员国,北欧地区实现了全面北约化,用以维持美俄关系的北欧平衡彻底终结。整个区域完全倒向美国主导的联盟,形成了模型中的“一边倒型”博弈结果。这对竞争性大国而言意味着“赢者通吃”。该案例表明,区域安全结构的演变并非必然走向“安全困境”式的两极对抗。区域性小国集团一早在 1949 年便选择与域外大国结盟,但集团二直至 2022 年才做出类似选择,且触发其结盟的威胁主要来自体系层次,即俄罗斯,而非区域内对手。这是因为,瑞典并未将集团一的结盟行为视为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因此未触发即时、对等的制衡反应。这完整展示了模型中“安全困境逃脱型”与“一边倒型”两种博弈结果的动态过程与转化条件。

## 五 结论

本文尝试对北欧国家差异化联盟选择的现象做出解释。理论回顾和研究设计部分的结论和主要发现包括:小国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通常存在制衡、中立和追随三种联合选择。小国从中立到结盟的动态转变过程需要特定的结构性条件,即不断加剧的区域乃至体系层次的压力会压缩小国的中立空间,加之潜在结盟大国的主动拉拢和邀约,共同推动小国作出决定。小国的结盟决策并非一蹴而就,共同利益、历史亲缘等非结构性因素会长期积累并形成联盟选择的倾向性,直至来自体系或区域层次的外部威胁冲击超过小国可承受阈值,从而触发结盟反应。威胁平衡理论虽能解释单个国家的结盟行为,但难以充分说明相似国家面对同一威胁冲击时联盟选择的差异性。为此,本文引入了区域层次的视角。然而,既有的区域主义研究大多聚焦于区域治理和区域组织,与联盟形成理论的结合欠缺。本文将北欧地区视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构建了“区域性小国集团”作为区域层次的研究主体,设立“历史经验”和“邻国政策参考”两个自变量,建立了小国结盟决策矩阵以及北欧国家差异化联盟选择的双层分析模型。

将分析框架代入实际案例中进行检验,本文得到以下结论。挪威、丹麦、冰岛以及瑞典、芬兰分别构成了两个区域性小国集团,同一区域集团内的国家之间拥

有深厚的亲缘关系与防务合作传统。挪威因被瑞典统治的历史经历,将瑞典视为区域威胁,拒绝了其关于建立斯堪的纳维亚防务联盟的提议;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立政策失败的历史经验、来自苏联的体系层次威胁以及美国的拉拢和邀约,挪威坚定选择加入北约。丹麦与冰岛则在“邻国政策参考”机制下,参考并追随了挪威的选择。然而,瑞典并未将上述三国的结盟行为视为威胁,基于其长期中立的成功历史经验而选择继续中立;芬兰由于苏联的压力而被迫中立。由此,北欧国家在1949年形成了“安全困境逃脱型”区域安全结构。冷战结束后,芬兰和瑞典不断深化与北约的联系,积累了结盟倾向。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使得源于俄罗斯的体系层次威胁超过两小国的可承受阈值,加之美国的积极推动,芬兰成为坚定的入约者,而犹豫的瑞典参考芬兰的选择后决定同步加入。至此,北欧国家全部加入北约,区域安全结构从“安全困境逃脱型”转化为“一边倒型”,实现了其战后防务政策从分歧到统一的完整演变。

综上,本文的立论主要基于小国为制衡威胁而结盟的逻辑,未深入探讨为扩张性利益而追随的情况。未来的研究可在两方面进行拓展:一方面是将研究主体从区域性小国集团拓展为更一般的区域性国家集团,纳入“中等强国+小国”的组合模式,以增强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另一方面是开展区域间比较研究。本研究仅聚焦于一个区域内国家的联盟选择差异,未来可通过纳入其他区域的案例进行检验与对比,从而构建更具普适性和更加宏观的理论模型。

(作者简介:陈慧文,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齐天骄)